

自序

這部「歷史的探索」收集了作者近年來在學思歷程的摸索中習作的十五篇文字，其中除了第十二、十四、十五等三篇讀書筆記是多年前的習作之外，其餘各篇多完稿於近三年之間。這些文字不論就題材的選擇或對問題的處理來說均屬不成熟之作，收集在這裡只是為這一個階段個人讀書思考的歷程留下一點雪泥鴻爪，也寓有自我鞭策以勵來茲的涵意在內。今乘集稿付梓的機會，對全書關懷的主題作一簡單介紹，以彰顯其意義。

本書所收錄文字共分二大類屬，第一類包括屬於讀書札記性質的五篇書評及二篇譯稿以及五篇個人習作。「讀史雜稿」部份除了第一篇討論歷史教育之外，其餘各篇文字均屬於西洋史範圍，這是我自己近來學習歷史的一個重心。在西洋史領域裡，古希臘史尤啟我遐思，心神嚮往。希臘古史源遠流長，自銅器時代（約公元前三〇〇〇年至一二〇〇年）以迄亞歷山大逝世（公元前三二三年）綿延三千餘年，其中世運興衰與人物賢奸相互遞嬗推移，在紛紜的史事中蘊涵著無數的歷史智慧與啓示。從文化史的立場，我們如說古希臘的歷史經驗為西方文化開宗立範融鑄規模實不為過，這種情況與我國先秦時代之為國史發展中最具創造性時代頗有異曲同工之妙。我國

過去讀書人常說：「書不讀秦漢以下，志在山水之間」，對先秦古史滿懷孺慕之情；西方人也很嚮往「希臘的榮光」（“The glory that was Greece”），⁷二十世紀初英國劍橋大學的古史學者史托巴特（J.B. Stobart）就以「希臘的榮光」（*The Glory That Was Greece: A Survey of Hellenic Culture and Civilization*, London: Sidgwick and Jackson Ltd., 1911）為題撰成鉅著，滿懷對古希臘的歷史情感。讀其書，誰能不為古希臘歷史世界的榮光動情？這種浪漫的情懷是我對希臘古史產生莫大興趣的最初動因。

但是，作為中國知識份子，我們只要對希臘古史作一個最浮面的觀察，並取而與國史發展的歷程一併思考，則立刻會面對一個嚴肅的歷史問題：何以古希臘城邦所行之民主政治可出現於近代西方世界而先秦之邦國林立未能為國史開出民本政治之格局？這個嚴肅的問題值得任何一位關心中國文化前途的人作一番理性的反省。記得十餘年前初讀熊十力（一八八五—一九六八）先生的「讀經示要」時，就為熊先生的一段話所吸引，這個問題開始橫梗於胸中，索解無由。熊先生說：

……今西洋學術或文化，其根源實在希臘。吾儕試尋繹諸子百家之微言碎義，持較希臘，似未見兩方路向有甚隔截處。然而希臘直啓現代文化。吾晚周諸子百家則早絕於距今二千數百年前，一蹶不可復振。此豈有他謬巧哉？神州大陸，既少海國交通之利，則賴列國並立，有朝聘、會盟、征伐等等，是以激揚志氣，開廣心胸，增益知見。此其學

術思想所由發達，文化所由高尚也。自呂政夷六國而為郡縣，使天下之人更守一邱之壑，老死而無所見聞，無所廣益。又厲行一夫獨裁之治，絕無民意機關，人民不得互相集合而有所致力於國家。夷狄盜賊每乘中央之昏亂而蜂起，奸天位以毒百姓。……中夏自秦以來，民主日憊，民德日偷，民智日塞，乃廣漠散漫之郡縣制度與專制政體所必有之結果也。諸子百家之學惡得而不絕滅哉？晚周盛業，視希臘或有過之而無不及，徒以秦漢之後環境改變，政制不良，遂以惡因，植茲惡果。
〔讀經示要，臺北：廣文書局，

民國五十九年十一月臺再版，卷二，頁五六—五七）

熊先生這一段文字寫於抗戰勝利前夕（民國三十四年六月），「寇迫桂黔之日」。這是在一番「念罔極而哀悽，痛生人之迷亂」（均見「讀經示要」自序）的心情與悲願之下，對中國文化所作的一番深刻的反省。我們細嚼熊先生這一番反省之言，可以觸及一個歷史現象，那就是：秦漢以降一元化的政治傳統的定型與先秦時代極富活力的多元的學術文化不相容，遂使後者遭遇挫折，無從開出民本政治的局面。

然而，在這裡又蘊涵著另一個歷史問題：先秦時代諸子思想中是否有與古希臘民主制度之精神相近之思想傳統？如果僅就其大處著眼，我們可以說：古希臘民主政治制度中所蘊涵的基本精神有二：一是政事取決於公意；二是政治公道與法治不可分。這兩項精神與戰國時代孟子政治思想實有若干不謀而合之處，這是一個很值得我們注意的現象。

關於孟子政治思想，時賢及前輩言之詳矣，我們在這裡僅作最簡要的討論。孔子論政特揭出「仁」之觀念，一切的政治活動都是爲了體顯這一個普遍性的道德價值而設施的。因此，在孔子看來，正確的君臣關係是：「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論語集註，四部備要本，卷六，先進第十，頁五，下半頁），所以「道不行，乘桴浮於海。」（論語集註，卷三，公冶長第五，頁二，下半頁）絕不因個人利祿的考慮而出賣「仁政」的理想。孔子對於政權的根據何在這個問題討論較少，但孟子對於這個問題則發揮得淋漓盡緻，這是孟子對儒學傳統所作的一項重大貢獻。孟子很明確地指出，政權之移轉以民意爲其根本根據。一切之政治措施均須以人民之利益以及多數人之公意爲取決之標準。孟子答齊宣王的一段話最足以體顯孟子政治思想的基本精神：

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馬，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馬，然後去之。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馬，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如此，然後可以爲民父母。（孟子，四部叢刊初編縮本，卷二，頁十七，上半頁—下半頁）

上面這一段文字中的「國人」指何而言仍是學界爭執未定的一個問題。但是全文中體顯出孟子之貴民重民思想則是十分清楚的。孟子上承周初貴民之思想（貴民之義屢見於「尚書」、「左傳」、

「國語」等古籍），揭出「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是故得乎丘民爲天子」（孟子，卷十四，盡心章句下，頁一一七，上半頁）的政治主張，這種政治思想與古希臘政事取決於人民的原則實有其精神相通之處，與近代西方民主政治之基本原則亦不相違背。蕭公權師嘗指出：「儒法二家之根本區別在貴民與尊君之一點。」（見師著，中國政治思想史，臺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民國五十年三版，頁二九〇），其說極是。不僅儒法政治思想以貴民與否分涇渭；孔門之「君子儒」與「小人儒」以及漢代以降董仲舒式的儒者與叔孫通式的儒者也以是否站在大多數老百姓的立場發言以爲判。

再就所謂「法治」的精神來說，孔子提倡成德之「君子」出而爲政治之領袖，稱許他的弟子雍以「可使南面」，頗沾人治主義之色彩。但孟子則人治與法治並重，所謂「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孟子，卷七，離婁章句上，頁五五，上半頁），在孟子的政治思想中，「仁心」與「仁政」乃一物之二面，不可分亦不能分，如果說前者是樹幹，則後者就是枝葉。無枝葉則本根不能以獨存，無樹幹則枝葉亦無所附麗。所以，孟子論政特重具體制度的建立，所謂「仁政必自經界始」（孟子，卷五，滕文公章句上，頁四一，下半頁），孟子對傳說中的井田、周室班爵制……等政治制度亦再三言之。所以子產主鄭國之政，不從事於政治制度之建立而專以小惠市恩，「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直斥之爲「惠而不知以爲政」（孟子，卷八，離婁章句下，頁六三，下半頁）。孟子強調合理的政治制度的建立以保障政治的公道。這種思想與古希臘

民主政治中講求法治的精神在基本上也沒有重大的出入。

我們以上簡單的討論旨在說明，孟子政治思想中所蘊涵的精神與古希臘民主政治的基本精神並不互相衝突，兩者間聲氣相通之處正不在少。

但是，為什麼先秦孟學中這種以民意為政權轉移之依據的政治思想無法落實到現實的層次上而開展出類似古代西方民主政治的生活方式？這個問題固然因其河漢無極而不可能有簡單的答案。但對這個問題試作揣測則仍是值得我們嘗試的努力。

首先，我們從地理上來看，古代巴爾幹半島以及地中海區域地狹多山，谷地狹窄而少空曠之大平原，很容易形成許多獨立的單位，這是希臘城邦形成的重要前提之一，分隔的地理環境為獨立的城邦提供了有利的條件。復因各個地理單位每有其不同的種族分野，畛域分明，尤易造成城邦之獨立性，兼之以小國寡民，政清事簡，容易採行民主的政治生活方式。反觀古代中國則在地理上自成一大單元，既無絕對難以逾越的地理障礙，而中原諸國又無種族上之畛域，這都很有利於一個一統天下的來臨。

但是，地理環境上的差異絕不是中西歷史異途發展的惟一原因。更重要的因素是中國統一的政治權威的出現較西方為早。遠在公元前第十一世紀，西周王朝的建立就意味著國史上統一的政治中心的開始。今日歷史學家對於西周是否一個嚴格意味下的「帝國」雖然仍議論紛紛，懸而未決（顧里雅〔H.G. Creel〕教授以為西周乃不折不扣之帝國，並以此意撰成專書，但學界持論

與彼相左者甚衆，此處不贅），但是從古籍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毛詩，四部叢刊本，卷十三，小雅，谷風之什，北山，頁六，下半頁）以及「天威不違顏咫尺」（國語，四部叢刊本，卷六，齊語，頁十，下半頁）的記載看來，西周王權的普遍性應是十分可觀的。自西周政權建立以降，國史的發展可以說是以統一為常而以分裂為變，故東周以來春秋戰國的大變局之後則有秦漢帝國四百餘年的一統局面的出現；魏晉南北朝的分裂之後則繼之以隋唐帝國的統一；五代十國的紛紛亂離，則隨之而有宋帝國的統一。如果說古代希臘世界所呈現的歷史主調是「融一於多」，是各城邦「自給自足」（希臘人所謂 autarkeia）之追求；則古代中國所強調的是「納多於一」，是尋求一統王權的建立。孟子對梁襄王之間曰：「定于一」，（孟子，卷一，梁惠王章句上，頁七一下半頁），這句話最能透露古代中國歷史發展的胎息。

這種追求一致而不容歧異的歷史傳統本來就與古代希臘民主政治的歷史發展各趣異途，到了秦帝國建立以後，「六王畢，四海一」，從此天下定於一尊，專制體制確立，「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中庸章句，四部備要本，第二十八章，頁二十，上半頁一下半頁。朱子引鄭氏曰：言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屈來果（Donald W. Treagold）教授所謂的東方文明的特徵如「政治一元論」、「社會一元論」、「對個體的不重視」……等（參看：氏著：*The West in Russia and China: Religious and Secular Thought in Modern Times*, Cambridge

at the University Press, 1973, Vol. 1, P. xxii) 現象自秦漢以降都已開始具體而微地呈現於歷史舞臺之上。秦漢以後歷史現實的發展與戰國時代孟子政治思想的理想循背反之一途，其間差距不可以道里計。所以，秦漢以後，「孟子之政治理想遂成爲針對虐政之永久抗議」（蕭公權師，前引書，頁九〇），不僅孟學中與西方民主政治原則互通之精神無由實現，孟學之殿堂在歷史上的若干時代裡竟一變而成爲抗議思想家控訴暴政反對專制的場所。例如，後漢趙岐（邠卿，公元一〇八？—一〇一）闡釋孟學於漢末政治極端杌陧之時代；公元第九世紀唐代的林慎思（公元八六九年進士）著「續孟子」（成書年代無可考，今有「知不足齋叢書」本）重申均役於民之要旨於晚唐之亂世。明太祖朱元璋（在位於一三六八—一三九八）讀「孟子」至草芥寇讎語，直欲將孟子逐出孔廟而後快，後雖因錢唐之上疏力諫而罷，但仍命劉三吾（公元一三一二—一三九九）等修「孟子節文」（成書於公元一三九四年），刪去與民本思想有關者共八十五條，課士不以命題，科舉不以取士（見：明史，四部備要本，卷一百三十八，頁一，上半頁）①。歷代儒

① 過去國立北平圖書館藏有洪武二十七年刊刻的「孟子節文」，今此書似已不可得。容肇祖曾對此書內容作過介紹，見氏著，「明太祖的『孟子節文』」，讀書與出版，第二年第四期（民國三十六年四月十五日），頁十六—廿一。關於孟子民本思想與皇權之不相容性，不僅在中國史如此，在日本史上亦然。一九七八年九月二日，京都大學島田虔次教授曾告筆者，日本古代宮廷中極重皇太子及皇家子弟之古典教育，尤重視中國之四書，但關於孟子書中之暴君放伐論及民本思想各章均略而不講，講官並在此類章節上特加眉批註明不必讀。此種加註眉批之孟子書今日仍有若干冊收藏於京都大學圖書館。

臣反抗專制帝王亦多引「孟子」爲據。凡此種種都可以反映出秦漢以後國史發展的現實與孟子政治思想的理想扞格不入，王船山（一六一九—一六九二）所謂的「儒者之統」與「帝王之統」（讀通鑑論，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民國六十五年台景印初版，卷十五，「宋文帝」，頁四九七）各趨異途之發展，以致先秦之理想終爲秦漢以後歷史之現實所出賣。史家貝克（Carl L. Becker）曾說：「生活與歷史常具有出賣人類的理想習性。」（氏著：*Modern Democracy*，Yale University Press, 1941, P.33）我們回顧中西古史在政治發展上的異趣，不禁爲之掩卷太息，慨嘆悲痛！

我們如果把中國的歷史傳統和希臘古史的發展作個對比，就可以很明顯地看出，國史的演進實以「帝國的統一性」爲其特質而希臘古史則以「城邦的自主性」爲其特點。爲了進一步闡述這個對比，讓我們再舉例說明。「春秋」經隱公元年有「元年春王正月」的記載，「公羊傳」會作這樣的解釋：

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曷為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春秋公羊經傳解詁，十三經注疏本，卷一，頁五，上半頁—頁八，下半頁）

從中國的歷史傳統看，王者受命卽位，自周侯以至要荒咸奉正朔，這種「大一統」的理想通貫國史數千年之進展歷程，一直是中國文化傳統綿延不絕的一個重要的思想動因，反觀古希臘的歷史

經驗則正好相反：波希戰爭（公元前四九〇—四八〇年）終而雅典帝國以起，帕羅奔尼撒戰爭（公元前四三一—四〇四年）終而斯巴達霸權代興。然兩者皆未能長治久安，傳諸久遠，其原因何在？所謂：「原始察終，見盛觀衰」，希臘古史所見雅典及斯巴達二大霸權旋起旋滅，其歷史原因固早已潛伏於其霸權始建之日矣。因為整個古代地中海歷史世界之根本特質就是在於各個城邦發展之自給自足，不論在理論及事實上都是如此。任何類型的「大一統」政治組織，不論是雅典帝國或是以斯巴達為首的帕羅奔尼撒同盟都與「自主性」這個希臘歷史傳統相逕庭，所以不旋踵而灰飛煙滅。英國史學大師伯利（J.B. Bury, 1861-1927）在論述從提洛同盟（The Confederacy of Delos）到雅典帝國的轉變時，特別把古希臘人追求「自給自足」的傳統提出來加以討論（看 J.B. Bury, *A History of Greece to the Death of Alexander the Great*,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PP.326-327），並指出這是雅典帝國覆亡的原因，這是很具有史識的解釋。

以上我們對中西古史發展的異趣作冗長的討論，主要目的是為了說明：任何一位中國知識份子觀察西洋古史必然會為古希臘所見的民主政治的歷史現象所吸引而欲探索其制度之特質、精神之所在及其轉變之契機。本書第一部份的第三及第五兩篇文字就是作者對這個問題摸索的一點初步結果。第三篇文字指出古希臘民主政治之發展乃是一個漸進的歷程；其基礎則係建立在一項具體制度之上：抽籤任官制及陶片流放制；而其根本精神則在於：「一，政事取決於公意；及二，政

治公道與法治不可分。就希臘古史所見的歷史經驗看來，民主政治的實施與教育的水準有密切關係。本書第四篇文字是一篇譯稿，原作者湯瑪斯（C.G. Thomas）教授就指出，柏拉圖的「理想國」一書與公元前第四世紀希臘政治生活的背景實有密切關係，前者可以視為對後者的一種反省與批判。

第五篇「亞歷山大帝國的政策及其問題」一文則探索亞歷山大（公元前三五六年—三二三年）作為希臘史上從城邦的獨立自主走向一統帝國的建立的橋樑人物如何處理其帝國平治的問題。從我們的分析可以看出，亞歷山大帝國之未能傳之久遠，不僅因為它未能在向心力與離心力之間取得一個恒久的平衡，更因為它未能正視希臘歷史中地方單元自給自足之傳統而予以妥當的安排。

在我們對希臘古史作這些觀察的時候，我們心中時時有著對中國歷史文化傳統的看法作參考。如此一來，就牽引出一個問題：怎樣才是一個理想的歷史教育？作為一個中國人，我們應如何從事西洋史的研究與教學的工作？本書第一篇及第二篇就分別探討這兩個問題。就個人知解所及，歷史教育一種人文教育，歷史知識是通往對於「人是什麼」這個問題的瞭解的有效途徑之一。因此，任何類型的「化約主義」（Reductionism）對歷史教育的人文意義而言都是一項重大的傷害。中國史學傳統特別重視史家的通識，就是要把史學研究與史學教育放在廣袤的人文層次上來處理。所以，太史公寫「史記」實際上是以寫一部人類全史為其鹄的的。太史公寫歷史，眼光廣被整個人類的活動，所以他不僅注重政治的變化，王朝的興衰，人物的賢奸，也論大道、

述貨殖、序遊俠，討論學術思想及社會經濟等各種活動。太史公史學中這種廣闊的視野與人文的眼光正是今天我們所應深加反省並賦予新的時代意義的。尤其今日社會科學在研究方法上對史學研究產生重大的挑戰，「人」被肢解為狹義的「經濟人」（*Homo Economicus*）、「政治人」（*Homo Politicus*）等的情況下，在史學研究題目日趨細微，而置人類歷史活動之大問題於不問，見樹不見林的學術潮流之下^②，史學研究與史學教育的人文學意義更值得我們三思。

我們如果持上述立場來從事歷史研究，那麼應如何考慮西洋史研究與教學的問題呢？本書第二篇文字就是我個人對這個問題的一點淺見。從理想的層次上說，在朝向一個對人類全史的通盤理解的大目標之下，我們理應揚棄「中國通史」及「西洋通史」兩分的傳統做法而企求邢義田先生所說的「世界史」體系的建立。但是，在現階段國內的外國史研究及教學的種種條件的限制以及其他各種主觀及客觀因素的考慮之下，一個植根於對本國文化的瞭解的基礎上的西洋史教學工作似乎仍是此時○○○此地所值得努力以赴的工作。換句話說，我們必須先在這項工作上有了基礎，才能進一步談「世界史」的研究與教學。所以，所謂「西洋史」與「世界史」的區分嚴格說來並不

② 哈佛大學的韓德林（Oscar Handlin）教授最近就指出近半世以來，史學研究中的量化技術的發展並未能實質上對史學研究中對大問題的掌握有所助益。這種批評雖不免持之太過，但自亦有其深刻的理由在。見：Oscar Handlin, *Truth in History* (Cambridge, Mas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 3-24, esp. P.11.

只是立場的問題，而且也是工作層次高低的問題。承邢義田兄惠允把他的「『世界史』抑中國文化立場的『西洋史』？」這篇論文收錄在本書之內。益友共學，匡我不逮，隆情高誼，衷心感念。

本書收錄的第二類文字屬於問學筆記性質。「沈宗瀚先生對我國農業現代化的看法」一文是爲紀念這位我國農業界前輩而作，也是作者另一部書稿「沈宗瀚先生年譜」（待刊）的導論。另外兩篇文字是負笈北美時獲緣向解讀乙系線狀文字的查德威克（John Chadwick）教授及哥倫比亞大學的狄百瑞（Wm. Theodore de Bary）教授請教邁錫尼文明及宋元明儒學研究時所留下的筆記。「萬里寄縱長是客」一文則是應中國時報之約而寫，敘述蕭公權師的學術與行誼，希望能表達高山仰止的心意於萬一。求學華大，讀書每有疑難輒向公權師請益，得到訓廸啓示，發我愚蒙。雷霆與雨露，一例是春風。謹遙祝公權師福壽康泰，松柏長青。本書所收大部份文字均寫成於西雅圖。寄寓西城期間，多承師友照顧，尤其是陳學霖師、Prof. Jack L. Dull, Prof. Carol G. Thomas, Dr. & Mrs. Robert Metz 及穆倫（Alan T. Wood）夫婦等，惠我良多，他們的情誼與西城煙雨、湖光山色一樣地令人懷念。

最後，本書中許多篇文字均承蕭公權師、王任光師、許倬雲師、邢義田兄及李弘祺兄過目，提 示意見，敬致深切謝意。書中疏漏錯誤之處，仍係作者之責任，尙祈學界先進惠賜指教。

庚申冬至後三日

黃俊傑自序於臺北